



西方学术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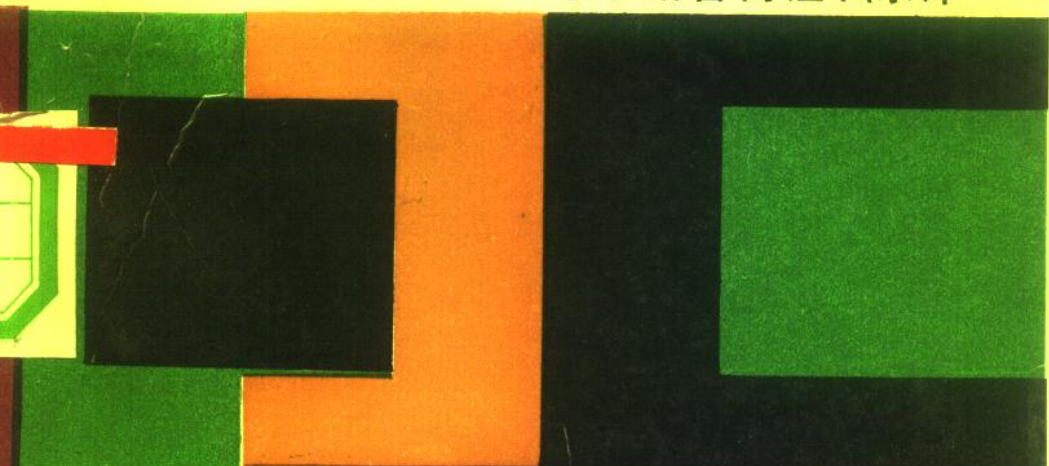
# TRADITION



EDWARD SHILS

# 论传统

[美] E. 希尔斯著 傅铿 吕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0010807\*

562111



2 020 8086 2

西方学术译丛

# 论传统

[美] E. 希尔斯著  
傅铿 吕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dward Shils Tradition

Faber and Faber's, London, 1981.

根据伦敦费伯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袁银昌

· 西方学术译丛 ·

论 传 统

[美] 厄·希尔斯 著

傅 德 吕 乐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312,000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内精装 800 本)

ISBN 7-208-00988-0/B·135

定价 (精) 11.60 元 (平) 7.15 元

# 西方学术译丛

## 出版絮语

---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当然，这套书并不以此为限，我们还将继续移译国内尚未介绍过的西方重要学术著作，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构成一个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在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出现学说纷呈、多维拓展和此消彼长的局面，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态势更引人注目，其中也不乏学术宏著巨篇。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将把它的翻译视点主要放在二十世纪。颇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各科的有益学说，都将成为我们选择和译介的对象。

6073 87/24

编辑出版这套译丛，我们存有一个素朴的愿望：既为了扩大读者的学术眼界，也为了促成国内学术界的创造。应该承认，西方学术著作，甚至是那些巨制，基本上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样，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以，当我们着手编辑《西方学术译丛》时，却在翘首盼望我国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的到来。

组织出版一套学术翻译丛书，是一项要求高、费力大的工程，尽管有人把当今世界看作“地球村”，但是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我们，要全面了解另一端世界的学术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为此，我们祈求海内外行家为这套丛书通信息、出主意、提建议，当然也欢迎给以批评与匡正。

一九八六年八月

#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

## ——译 序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11— )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早在1951年,他便与当时美国社会学界领袖人物、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合编了《迈向一般的行动理论》(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划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五种“模式变量”。以后,希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涉及极为广泛的领域;他研究文化传播、宗教、价值和社会整合的论文收入了《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文集》(Center and Periphery, 1975年)一书,其中“克里斯玛的会聚和消散”和“论克里斯玛”两文进一步延伸扩大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作为领袖人物非凡天赋的克里斯玛(Charisma)概念,用它来分析传统的文化、制度和习俗的神圣性,以及它们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他探讨知识分子及其社会作用的论文编成了《知识分子与权力》(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Power)一书;研究西方社会学史、社会科学和国家政策关系等的论文汇成了《社会学的天职》(The Calling of Sociology)一书。

我们现在翻译的《论传统》一书是希尔斯教授积 25 年的潜心研究而逐渐写成的著作，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传统的力作。它从社会学角度着重探究了传统的涵义、形成、变迁、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创造性、启蒙运动以来的反传统主义、社会体制、宗教、科学、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传统，以及传统的不可或缺性等等问题。希尔斯尤其是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中把传统与科学理性视为对立的流行观点，指出传统并不完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启蒙学者和技术至上的科学主义者也并没有逃脱过去传统的掌心。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 *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这也是英语中 *tradition* 一词最基本的涵义。从这种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它们包括物质产品，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思想，对人物、事件、习俗和体制的认识。具体地说，传统包括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刻所继承的建筑、纪念碑、景观、雕塑、绘画、书籍、工具、以及保存在人们记忆和语言中的所有象征建构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s*)。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以及独特的行为模式、关于行为模式的观念和信仰，都是代代相传意义上的传统。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是人类创造

的、赋有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

不过“传统”一词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渊源，相近的表现方式和出发点，从而它们的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联结其间。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古希腊民主的传统”、“个人主义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或者“儒家思想的传统”、“专制君主的传统”、“文人画的传统”等等。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希尔斯教授特别探讨了实质性传统 (substantive tradition) 及其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命运。所谓实质性传统也即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蕴含传统的制度，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如对宗教和家庭的感情，对祖先和权威的敬重，对家乡的怀恋之情等。启蒙运动激烈地讨伐了此类实质性传统，启蒙学者指出这些传统未经理性和经验科学的证实，甚至也不能由系统的观察和逻辑所证实，它们只因为长期存在，并历来为人们所信奉，所以才受到敬重，因而是科学理性的对立面，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希尔斯则认为启蒙学者对待实质性传统的态度未免失之于肤浅。许多实质性传统



都是人类原始心理倾向的表露，如敬重权威和道德规范、思念过去、依恋家乡和集体、信仰上帝、渴求家庭的温情，等等，都属于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原始心理需要。实质性传统也并没有象现代社会的预言家（如圣西门、马克斯·韦伯）所预测的那样迅速地消亡。希尔斯说道：“……实质性传统还继续存在，这倒不是因为它们是仍未破除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缺少了它们便不能生存下去。”1989年度获得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美国影片《怪杰雷曼》就表现了现代人对实质性传统的渴望：雷曼代表因现代社会的工作秩序而失去理性的神经症患者，他兄弟理查则是现代消费社会中玩乐狂和金钱狂的缩影，他们都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和思潮（工作压力和享乐主义文化）而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即“雨人”所象征的人类纯真感情、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以及童年的美好回忆。因而，“雨人”即象征着围绕人类原始感情的部分实质性传统。另一部同样由霍夫曼主演的《克莱默夫妇》则更明显地反映了生活在丰裕社会中的人们对实质性传统的渴望。

实质性传统之所以能长期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依恋，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是因为这些传统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Charisma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天赋。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 Sohm 用它来指基督教教会的超世俗性质。马克斯·韦伯则全面延伸、扩大了Charisma的涵义，既用它来指具有神圣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非凡体格特质或精神特质，如先知、巫师、立法者、军事首领和神话英雄等的超凡本领或神授能力，也用它来指一切与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中的事物相

对立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神圣特质，如皇家血统或贵族世系。后者是常规化的或制度化的克里斯玛。（参阅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Vol .2，第1116、1121页）。实际上我们知道，神圣的或超凡的克里斯玛特质并不是神授的，而是被社会赋予的，是由于社会中的追随者都相信他们的权威人物具有神授能力，所以克里斯玛人物才会具有一呼百应的神圣感召力。

希尔斯教授则更进一步引伸了 Charisma 的含义。他认为不仅仅是那些具有（或被认为具有）超凡特质的权威及其血统能够产生神圣的感召力，而且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超凡力量相关联，同样具有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克里斯玛特质。这样，在社会中行之有效的道德伦理、法律、规范、制度和象征符号等都或多或少被注入了与超凡力量有关的克里斯玛特质。康德说，令人们敬畏的事物莫过于头上的星空和人间的道德规范。这是因为这些自然和社会中的秩序常会使人感到它们仿佛来自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显然，传统对人的行为之所以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都是由于传统被人们赋予了神圣的或超凡的特质。事实上，围绕着某一种传统，一般都有一套神话和仪式，以唤起或激发信奉者的敬畏之情。对信奉者来说，某个传统的创始人或创始事件（如耶稣、华盛顿、马克思以及关于他们的故事）一般都带有异乎寻常的、奇迹般的神圣色彩。这些创始人一般都具有（或者被认为具有）异乎寻常的想象力、非凡的品格和美德，都超越于日常的或世俗的生活，当然更不用说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了——所

有这些都属于超凡的克里斯玛特质。创建某个传统的确需要具有辉煌想象力和非凡品质的克里斯玛人物，以及作为里程碑式纪念对象的克里斯玛事件（如耶稣受难、独立战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但是无可否认，传统的克里斯玛特质也是由其信奉者们所赋予的，围绕着纪念日、经典和创始人的一圈圈神圣光环已抹上了神话和礼仪的色彩。换言之，一种传统如果失去了其克里斯玛特质，不再被人们感到是超凡的、神圣的、或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意义的，那么人们便不会为其献身或坚决捍卫它了，同时它也逐渐失去了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了。传统的伦理规范、制度、法律和象征符号丧失其克里斯玛特质后，人们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处于一种失范（anomie）状态，亦即失去了共同的规范和道德理想。

马克斯·韦伯指出，克里斯玛式人格是历史上尤其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由于克里斯玛统治下的法规来自于高度个人化的对神恩的体验，以及神一般的英雄力量，并且为了体现先知式的精神气质而排除了所有外在秩序，所以克里斯玛统治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转变了所有价值观，破除了所有传统的和理性的规范。（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Vol.2，第1115页）。这就是说，不仅创建一种传统需要非凡的克里斯玛式的想象力（当然也需要魄力，记忆力和推理能力），而且破除一种传统同样离不开克里斯玛特质，甚至需要有双倍的克里斯玛特质。因为破除一种传统必须同时创建一种更适合时宜和环境的、也更富于想象力的新传统；只有在新传统的克里斯玛力量压倒了旧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后，旧传统才会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新传统才

会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才会深入人心。否则的话，凭空是不能破除传统的。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没有更好的、更具克里斯玛的传统，旧传统就会死灰复燃。所谓“不破不立”，作为一种规律事实上应该倒过来说，即“不立不破”，因为创造传统比破除传统要困难得多。西方历史上的“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是用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的过程，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没有真正破除旧传统，就在于它并没有创造出符合时代的、真正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新传统来。

但是，伴随近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法制化和市场化而来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趋势，则大大冲淡了古老传统原来所具有的克里斯玛色彩。实验科学和理性判断取代了迷信巫术和无知，以契约和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摧毁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乡土社会中的家庭关系，高度组织化的、职能分化的科层制度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组织（行会、乡村社区）。正如马克思 150 年前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理性化可以概括为一种原则，那就是按照一种统一的中心准绳，将所有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贯的逻辑系统之中，以最有效的科学手段来实现人们的理想目标。这和传统社会注重人伦关系、与生俱来的地位、乡土感情等原则是完全相反的。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西方的发展社会学家或现代化研究者都在某种程度上

继承了韦伯的思想,他们提出现代化的内核就是理性化,因为按照韦伯的观点,科技化、法律化、货币化、世俗化和科层化都是理性化的最典型的不同表现。因而理性化被看成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和根本,而以往社会留下的种种传统则成了理性化或现代化的死敌。希尔斯指出,当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一大批文人学者和政治家都在坚持和追求一种已经自成传统的“发展”理想(“dynamic”ideals)。“这是一些要求人们积极地、有意识地摆脱信仰和行动的实质性传统模式的理想。它们意味着应用抽象原则的理性,以及彻底地运用经验知识来实现这些社会中迄未达到的目标。在西方社会中,‘发展’理想要求人们与传统的观察方式和行事方式决裂”。“达到理性化理想的那个过程的名称本身就相当重要;人们给它起了‘现代化’的名称”。

如果这种理性化的理想完全实现了,那么除了世俗性、科学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传统之外,所有的实质性传统都将被消灭。而事实上理性化仅仅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它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至于实质性传统,则如前所述,虽然它们已经大大削弱了,但还是大量地存在着,而且大有复兴的趋势。

对实质性传统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科学主义世界观和享乐主义的文化,而且还有以个人主义相标榜的个人解放运动。它力图摆脱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强制性束缚,以发挥个人的首创性和追求个人的幸福。远的不说,这场运动从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驱算起,经过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代言人,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个人解放的倡导者将实质性传统看作是所有传统的代表,看作是实现他们目标的重大障碍,并试图破除一切传统。个人解放和科学主义世界观合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但

是希尔斯着重指出，“那些对传统视而不见的人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正如同当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学的时候，并没有逃出传统的掌心一样”。

正如理性化或现代化的规划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实质性传统一样，理性化或现代化的障碍也不单单是来自于实质性传统。实质性传统与现代化亦不是完全对立的。理性化的理想或规划之所以不能完全实现，部分地是因为，人类生活的目标并不是完全能由理性来建构的，或以最佳手段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的部分生活目标注定就是非理性的。其次，那些制定政策或握有权力的人还存在着绝对的、不可化约的非理性因素，而且对自己所处的局面了解得太少，执政者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他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来说，也实在是太少了。再次，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各种社会集团利益之间的冲突，也都使现代化的规划受到极大的牵制。最后，尽管统治者身上充满了种种矛盾和缺陷，他们却依然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个人意志全面而深透地强加在臣民身上。总之，尽管理性化规划导致了愈来愈集中的中央权力，但它仍然不能胜任统筹安排所有理性化活动的任务。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属于实质性传统，然而对于现代化事业来说，它们恐怕构成了比实质性传统更为严重的障碍。

最后我们要提醒读者，爱德华·希尔斯是一位与英国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一样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家，他反复指出了进步主义世界观和极端个人主义(所谓个人解放主义)的缺陷和肤浅之处，却没有详尽剖析实质性传统对现代化事业的阻碍作用。

\* \* \* \*

本书导论及第1—3章由吕乐译,第4—10章及术语表由傅铿译;全书并由傅铿统一校核。

张志国先生和屠玮涓女士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谨此深表谢意。

傅 铿

1989年4月25日

## 原 序

这部关于传统的书证明我们需要传统。如果已经有了其它关于传统的综合性著作，那么本书就有可能更为完美，因为我就有了易于启笔写作的出发点，就能有一个标准，也能意识到遗漏和误解。可是没有这样的著作。只有许多关于特定传统的论著，有的是关于伊斯兰神学和法律的传统，有的是关于犹太教的传统，以及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传统。还有专门关于文学、艺术和法律传统的著作。然而，却没有一本有关传统的书去探讨传统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因素，分析传统在人类生活中所造成的差异。

而这就是本书的宗旨。

我大约在 25 年前开始本书的写作。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始于 1956 年的许多研究班课程的主题。1974 年秋季，我受设在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的邀请去该校作纪念 T. S. 艾略特的系列讲座。对此，我欣然接受，因为我想我能利用这一机会整理一下我关于这一庞杂主题的思考，同时表达我对 T. S. 艾略特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的作品激发并且充实了我对传统问题的思考。

自 1974 年以来，我作的这些系列报告已几经修改。现在我



将它们呈于公众面前，接受他们的检查和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该课题的基本方面全都作了论述，因而感到自我满足。我相信，传统这一主题不仅极为重要，而且不可穷尽。

世界上的人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传统的性质，并更好地赏识其价值。我希望，此书的问世将促使富有思想的学者们对该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澄清、修改和深化本书中的观点。

我衷心感谢 Faber & Faber 出版公司的经理们，以及坎特伯雷的莫莉·玛胡德教授及其同事们，因为他们邀请我作 1974 年纪念 T. S. 艾略特的系列讲座，并且对我的报告表示了深切的理解。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和 Peter House 兄弟会会员，他们不厌其烦，乐于助人，为我提供了工作条件，并且给我以友谊。

但愿马克斯·韦伯和 T. S. 艾略特的在天之灵对我所做的对他们关于传统问题的一些深奥思想含义的解释宽容待之。

爱德华·希尔斯